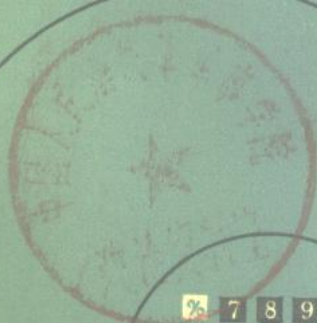


经济研究丛刊

国民经济调整 与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



经济研究
丛 刊

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 体 制 改 革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209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4099.386 定价 0.92 元

目 录

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	孙冶方(1)
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谷书堂 常修泽(8)
试论影响产业结构的若干因素·····	周叔莲 吴敬琏(23)
论我国经济体制调整与改革的模式问题·····	白拓方(38)
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何竹康(62)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葛霖生(80)
关于正确处理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	谢明干 江春泽(92)
经济预测与国民经济调整·····	黄学忠 邓志阳(109)
试论积累效果和积累率的关系问题·····	丁 华 沈志群(124)
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必须重视内含扩大再生产 ·····	冯浩华(137)
我对当前讨论积累和消费关系问题的一点意见·····	徐炳文(157)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综合平衡的几个问题 ·····	关效荣(173)
对调整我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初步意见·····	雷锡禄(186)
集体所有制农业的管理体制改革·····	常明莲(199)
谈谈农业生产责任制·····	仰 之(210)
农村商业体制改革初探·····	肖文杰 万 东(221)
试论银行的体制改革问题·····	刘 隆(232)

从经济体制改革看运用税收工具调节盈利水平的重要性	韩绍初(240)
试论资金利润率指标的应用	杨树滋(255)
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坚持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	代成周为尧(274)
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讨论简介	王永江(286)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	中国金融学会 广东金融学会(293)

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 取得最大的效果*

孙 冶 方

我们今天能够就经济效果问题召开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在十年内乱时代，讲生产，讲经济，尤其讲经济效果，就是政治不挂帅，就是不讲阶级斗争。记得五十年代末，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纲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贯穿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是什么？有的同志说，这条红线是阶级斗争；也有同志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我说，我完全同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讲阶级斗争，就是说，我们要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讲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成一本政治教科书，写成一本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我们要通过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通过政治经济学来谈阶级斗争，而不是一般地谈阶级斗争。我又说，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

* 这是孙冶方同志在经济效果理论问题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里，应该反映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基本矛盾，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既有基本上相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还要不断地前进，以便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成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我们也要表现出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历史唯物论，不同于哲学的特点。如果仅仅讲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些一般的哲学原理，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哲学教科书就没有区别了。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怎样不同于政治读本、阶级斗争读本，不同于哲学教科书、不同于历史唯物论教科书呢？那就是我们要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经济、更能够推进生产的发展。总而言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而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来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能够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更大的效果，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可是没料到我的“最小……最大”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更早一些，在“四清”运动中间，被当作不要政治挂帅，否定阶级斗争的罪行，加以批判。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我想，不讲最小最大，那么能够倒过来讲最大最小，以最大的耗费来取得最小的效果吗？当然那时我不敢这样问。可是现在经过十年动乱，客观事实正是证明，二十多年来，我们就是以最大的耗费取得最小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大批利润挂帅，只能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破坏生产有功，抓生产有罪，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给社会主义抹了黑。反对

讲最小最大，反对讲经济效果，空讲政治挂帅，空讲阶级斗争，结果走到了反面，变成了最大最小。其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该发展生产，讲究经济效果，这些话，毛泽东同志早在解放以前就曾经讲过。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后来，在《勤俭办社》这篇文章的按语中他还说过，“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②他在对《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说：“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③这几段引语，既讲发展生产，又讲经济和节约。这也就是最小最大的原则。可是没有想到，后来讲最小最大变成了反对阶级斗争，否定政治挂帅的罪证，而去提倡最大最小，倒过来了。结果就是我才说的，给社会主义抹了黑。我相信，出席这个会议的在座的同志，都有这个信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6年横排本，第980页。

②毛泽东：《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第54页。

③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页。

心，相信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今天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了优越性，而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干扰，没有充分发挥。我们今天把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的这一套胡说都否定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提倡最小最大，提倡讲经济效果，这就是我们又重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大踏步前进的一个标志。只要我们全国一切经济事业都按照这一个“最小最大”的原则，按照讲经济效果这个道路向前走，我们就有信心，不要很多时间，我们就能够赶上，而且最终要超过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提高我们的农业、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以及其它各方面经济活动中的效果，基本上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就是改善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一个就是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而对于一切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的改造、改善，对于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我们都必须从最小最大的角度，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加以测定。因此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不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现在所说的理论经济学，而且要研究具体经济学，包括我们过去常说的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等等；而且要提倡研究技术经济学。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技术经济研究所，这个技术经济研究机构到底是独立、单独一个好，还是在各个经济所中间加一个技术经济研究室好，这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要提倡研究技术经济学，研究技术定额。通过技术定额来测算一切经营管理和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这是很必要的。过去，我们对具体经济学，对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研究不够。尤其对于技术经济学，我们过去否定的多。因此，我是没有研究过，没有发言权。我还是谈我的老本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讲经济效果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没有工作

可以做的。相反，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破除、要批判自然经济的思想，因为自然经济的思想不讲产品的两重性，不讲经济效果，如果要讲，往往只是同商品经济挂钩，好象没有了商品经济，就不要讲经济效果，不要讲产品的两重性，不要讲最小最大了。我不想扯得太远，我只想说明，自然经济是没有产品两重性观念，没有价值观念。比如说，我们去问一个农民：你做的这个桌子花多少钱？多少价值？他没办法回答你。他说：我这个不花钱的，我的木料，是我院子里面一棵树，我把它砍下来以后锯成木板，锯成木条，做成了这个桌子。这都是我在农闲的时候，夜晚抽空做的，不算工钱。在他看来，不花钱好象就是没有价值。你问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价值这些概念，他更不懂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概念，在小农、个体农民来说，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也没有抽象劳动的概念，只有具体劳动的概念。所以你问他桌子怎么做的，他只有砍树的劳动、锯木板的劳动、锯木条的劳动、把木板、木条装成一个桌子的劳动。而没有一个抽象劳动的概念，只有具体劳动的概念，就不会有社会平均必要劳动的观念，更没有我们所说的价值的观念。那么，小农个体生产者集体化以后，他是不是有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观念了呢？也不一定。一般说，小农看合作化以后的大生产、联合生产，不是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他是从封建庄园经济的角度来想象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生产的，而封建庄园经济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同样没有流通、没有交换、没有抽象劳动的观念，没有社会平均必要劳动的观念，没有价值观念，也不讲经济效果。我们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我觉得也反映着这种自然经济的观点。我记得我在一

篇文章中曾经讲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的计划委员会（计划部门），同财贸部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脱节的。我们的计划部门只注意实物量的指标，只注意使用价值指标，我们讲速度，讲产品产量，都是讲的使用价值量。我们的总产值，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自然是一个综合的实物量指标，而计划的编制，主要讲速度，讲产品产量，实际上就是管实物量指标。而流通和价值指标都是归财贸系统、归财贸口管的。这就是说，我们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分口管的。这一套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是从苏联搬来的。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自然经济的观点也统治着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我们这套计划制度最初发生的地方在苏联，它就是在自然经济思想指导之下建立起来的，着重于使用价值指标的计划，而不注意价值量指标，不注意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供产销脱节，都是使用价值与价值分口管理，使用价值与价值脱节，否定流通，不讲经济效益等等的结果，是自然经济思想的产物。因此我认为要改变现在这种生产与需要脱节，基本建设与财力、物力、人力脱节，基本建设不考虑到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性，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实物量指标由计划部门管理，而价值量指标由财贸部门管理互相脱节的这种体制形式。而要改变这种体制形式，我们在思想上，在经济学上，必须从最基本的概念宣传起，就是说，为了提倡讲究经济效益，必须从劳动的两重性、产品的两重性，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重性讲起，从政治经济学的ABC讲起。为此，我们必须为最早的（一八四三年底至一八四四年一月）的一篇“天才的”（马克思的原话）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恢复名誉，特别要为这篇文章中

的一句名言恢复名誉。“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因为我们所说“最小最大”就是撙以最小的费用争取最大的效用，即最大的使用价值。这篇著作虽则马克思在晚年时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推崇为天才的著作，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说他对价值这概念的界限是由《资本论》的出版而得到了论证。可是这篇天才的名著却因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委员会》一个注释，说恩格斯此文还没有摆脱“人道主义”观点，他本人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加以全面否定。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也跟在这一注释后面，大喊大叫，大反“人道主义”而走上了十年内乱时代的大发兽道主义。一句话，我们要讲经济效果，不仅我们的具体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要深入研究，而且我们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也要努力工作，深入研究，广为宣传。

我衷心祝愿这次大会开得圆满成功！

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 市场的结合

谷书堂 常修泽

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自从1979年春天提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以来，经济理论界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实际部门也进行了初步的实验。但是，这些探索都还处在刚刚开始阶段，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例如，究竟什么是调节？计划调节、市场调节的涵义应当如何理解？计划指导和计划调节是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客观必然性是什么？特别是，计划与市场到底如何结合？这些都有必要深入研究。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不是主观臆定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客观必然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有机统一来看。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而且不平衡，因而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但是，在这多种经济成分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居于领导地位，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必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还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从而在个人之间或企业之间都还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正是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企业之间还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所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是兼有上述两个特征的有机统一体。

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要求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包括计划指导和有限度的指令性计划调节），以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与需要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求根据商品经济的自身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达到以最小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特点所要求的。

第二，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调节社会劳动在各部门分配的诸规律的作用来看。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有机统一体，因而调节社会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就有两类客观规律。一类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规律，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一类是商品经济的固有规

律即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规律对社会生产都具有调节作用。这些调节作用不是彼此对立，而是从不同方面并行不悖地发生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主要调节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向，即社会生产发展所要服从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下，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一般说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从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平衡出发，调节社会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价值规律则是从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或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补偿出发来进行调节。要实现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要求，就必须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计划指导和在必要的范围内通过下达指令性指标来加以调节；而要实现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则不能不通过市场来进行。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节社会生产的诸规律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发生作用的，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只要我们运用得当，把它们的作用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带来积极的效果。要作到这种正确结合，就要把计划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从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结合来看。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利益关系：一是国家利益；二是集体（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利益；三是劳动者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要的也就是这三方面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大多数场合可以通过合理调整利益来解决。只有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才能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这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战略措施。一般地说，国家计划（包括计划指导和计

划调节)是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的,而市场调节直接体现的则是企业利益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当然,我们不应该把三者的利益截然分割开,但是必须看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所以,通过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实现由单一的国家决策过渡到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决策相结合的转变,这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是从1979年着手进行的。一开始先抓扩大企业自主权,特别企业的利润分成。随着试点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权主要停留在分配领域还不够,必须扩大到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打破过去那种单一的计划调节的局面。如果说,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那末,实现市场调节则是一个关键措施。因而,我们认为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整个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二

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市场究竟如何结合,是当前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一些实际部门的普遍看法是:过去单一的计划调节统得过死,现在在计划调节旁边开了个“小口”,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了计划内和计划外两块。凡是计划内的生产和经营(指由国家用指令性指标安排生产任务,由上级供应原材料,由商业部门或物资部门收购产品)就叫计划调节;凡是计划外的生产和

经营（指由企业自己“揽活”，原材料由企业自己“找米下锅”，产品自己推销）就叫市场调节。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各管一块，互相制约补充，这样两块的结合就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例如，国家经委提出今年工业总产值中市场调节部分占15%，计划调节部分占85%，就是这样理解结合的一种反映。现在人们都把持这种看法的叫做“板块式”结合观点。

经济理论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不应当把整个国民经济分成两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融合为一个“统一的胶合体”。“所有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都统一在这两种调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胶合体里，接受非指令性的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指令性的计划调节则可基本取消，即使留一些也“只限于个别的暂时的结合”，即在“特殊情况下”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是“原则的例外”。对这种看法，起初都称之为“渗透论”，后来也有称之为“胶体论”的。^①

我们认为，前面讲的实际部门的看法，反映了当前刚刚开始阶段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现实状况。在这以前，单一的计划调节统管着整个经济活动，现在一旦提出要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并且开始实行市场调节的试点，势必只能从某些部门或某些产品先打开一个缺口（一年多来，主要是在部分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方面和生活资料的“统购包销”方面打开了缺口），这就自然形成了两块“板块”。可见，两块“板块”的形成，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较之过去单一的计划调节，是一个很大

^①刘国光：《略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10期。